

求索者

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



QIUSUOZHE



商務印書館

本

本

本



求
索
者

目 录

徐通锵先生生平	北京大学中文系 1
一生探求:结合中西 贯通古今 立足汉语建设语言	王洪君 李娟 4
理论——徐通锵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王洪君 李娟 4
沿着徐先生的道路继续前进	沈家煊 26
孜孜不倦的求知者	胡壮麟 29
汉语研究与字本位——悼念徐通锵先生	王 宁 32
他“思想过”·“徐通锵难题”	鲁国尧 35
具体语言研究与语言理论研究相结合——怀念徐通锵先生	戴庆厦 48
徐通锵的历史地位	潘文国 51
徐著《历史语言学》	张光宇 58
心底相通自古今——悼徐通锵先生	冯胜利 78
徐通锵先生与《语文研究》	温端政 沈慧云 81
纪念建设汉语本体语言学的旗手徐通锵先生	“汉语字本位研究丛书”编委会 86
沉痛哀悼徐通锵先生	吕必松 90
跟随徐通锵先生学习“字本位”——沉痛悼念我最敬仰的中国语言学大师	杨自俭 95

先生已逝,理论犹新	宋金兰 120
徐通锵先生的字本位语言理论概述	李 娟 127
深切怀念同窗好友徐通锵	郑芳怀 147
怀念徐通锵 学习徐通锵	李志秀 152
看来朴素无华 实则光彩照人——悼通锵	王福堂 159
“徐格里”,走好	赵世开 166
斯人已逝 吾失良友——悼念徐通锵教授	何耿丰 168
痛悼老友徐通锵	陈松岑 170
悼念徐“老头”通锵兄	唐作藩 176
在语言学领域中辛勤耕耘一生的学者——悼念通锵 ..	王理嘉 180
悼通锵兄并追忆几位学长	张清源 189
怀念通锵兄	裘锡圭 193
勤力垦拓 著有实绩——追怀师兄徐通锵教授	向光忠 195
哭通锵	曹先擢 203
痛悼挚友通锵	李行健 205
一位真正的学者——长念通锵	史有为 213
春蚕到死丝未尽——怀念徐通锵老师	蒋绍愚 220
记徐通锵先生二三事	邵敬敏 224
徐通锵老师,安息吧!	王若江 229
回忆跟徐通锵老师的点滴交往	袁毓林 233
一位实实在在的老师	胡敕瑞 238
徐老莞尔在安息	张光宇 242
像徐通锵先生那样探索中国语言学的新路	汪 平 244
治学大道 永垂不朽	李葆嘉 247

纪念徐通锵先生	岑运强 249
一介书生 清清爽爽——追怀徐通锵先生	姚小平 251
感念徐通锵先生对我的教诲	张 博 253
真正的学者徐通锵先生	石毓智 258
怀念徐先生	曾晓渝 263
一米温暖的夕阳——我所知道的徐通锵先生	张振江 266
大家风范 高山仰止——写在徐通锵先生辞世百日之时	曹 炜 283
师祭	何 丹 289
一件小事	周静芳 291
难忘的合作	胡吉成 293
严谨却不因人而废言的徐通锵先生	陈宁萍 298
一颗平静而跃动的智者之心——怀念徐通锵先生	孙玉石 301
令人怀念的十九斋——追念徐通锵先生	费振刚 306
朴实认真,疾恶如仇——忆通锵同志	段宝林 311
悼念徐通锵先生	陈曦钟 313
行过未名湖边	陈平原 316
比我老的“老头”	张 晓 319
斯人已去 真情常在	卢宁 卢培元 丘佩玲 323
徐老师指导我做硕士论文	王洪君 327
怀念徐老师	陈保亚 345
徐老师是指导我科研上路的严师	赵 杰 362
师恩难忘——徐老师领我走上语言学之路	新光瑾 366
老师引领我思想飞扬	李 娟 373

一位特立独行的语言理论家——追思我的导师徐通锵	
先生	叶文曦 381
这师,这情,这般怀念	荣 晶 388
怀念敬爱的徐老师	高晓虹 396
跟徐老师做论文的那些日子	王 静 399
师者如斯,逝者如斯	陈卫恒 403
徐门问学记	杨立权 407
徐老师学术思想助我完成博士论文	孙景涛 420
那无拘无束的幸福	刘一之 425
怀念徐通锵老师	崔希亮 428
一份难忘的作业	王红旗 431
永远的引路人	王刚 马亦凡 434
回忆徐通锵老师	谢俊英 439
蚂蚱说——徐师归去纪事	方 希 442
清风徐来——来自蚂蚱三	李 倩 447
高山仰止,纯净高远	徐晶凝 451
怀念徐老师	汪 锋 454
您在天堂还好吗——怀念徐老师	宋作艳 458
我心中永远的徐老师	张博岩 463
恩师·爷爷	邝剑菁 465
给徐伯伯的一封信	刘黎黎 471
善不由外来兮,名不可以虚作——纪念我的父亲	徐 涛 477
挽联、诗文、唁电、唁文选	北京大学中文系等 484
致谢信	丁宁真等 495

最后一封邮件	徐通锵 496
徐通锵教授访谈录	张 宜 497
徐通锵先生论著总目	529
编后记	《徐通锵先生纪念文集》编委会 535

徐通锵先生生平

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共产党党员徐通锵先生，因病于2006年11月25日19点50分在北京辞世。

徐通锵先生1931年11月生于浙江宁海。1952年浙江省立宁波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语文专业。1956年毕业后留校，在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师从高名凯先生从事理论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2年9月至1983年9月赴美国加大（柏克莱）进修访学，主修历史语言学。曾多年担任语言学教研室主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博士点博士生导师、学科带头人。并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商务印书馆语言学出版基金评议委员、《语言学论丛》编委。

徐通锵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语言学理论的建设，强调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努力引导年轻的语言研究者走上密切联系汉语实际、以材料的梳理为基础的语言理论研究的道路，为中国语言学理论研究树立了一种范式。

他的论著兼通古今中外，多有发现和创新。《语言学纲要》（1981，与叶蜚声合作）是他学术研究第一阶段

的代表作。该书明确地以结构主义语言思想为基础,以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为描写语言各层面结构关系的纲领,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语言结构性质做出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一部理论严谨、内容充实、阐述清晰、深入浅出的教材,在国内高校语言学教学领域影响广泛。该书在海内外多次再版,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二等奖。

《历史语言学》(1991)是徐通锵先生在语言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的又一部重要研究著作。该书系统地阐述了历史语言学的基本理论,运用到汉语方言和汉语历史音韵领域,深化了许多个案研究,并在音变理论方面有新的建树。这一著述是中西语言学结合的重要成果,获北京市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教育部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最近十年徐通锵先生以“字本位”理论为基础的语义句法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1997)是这一时期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论著以“字”为汉语基本结构单位,以此为核心构建了汉语研究的新的理论体系,为中国语言学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该论著获北京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此外,教育部“九五”规划教材《基础语言学教程》(2001)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著述。

徐通锵先生朴素坦荡,不羨虚名浮利。他一生专心学术,认准了中西结合、以汉语研究为基础进行语言理论建设的道路,就不惧艰难地探索耕耘。他忠诚教育事业,生前最后一个学期还在第一线授课。他关爱学生,无保留地指导学生,鼓励学生修正老师的主张,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他的品格,他的学问,他的音容笑貌,永存友人

学生心中。

淹贯中西，出入古今，殚精竭虑开新径

融汇新旧，承启先后，桃李遍植惠后人

徐通锵先生千古！

(北京大学中文系 2006 年 11 月 26 日)

一生探求:结合中西 贯通古今 立足汉语建设语言理论

——徐通锵先生学术思想评述

王洪君 李娟

徐通锵先生一生著有专著7部、自选论文集2部、论文70余篇。它们宣示着先生的学术诉求:在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基本精神的基础上,立足汉语,深层次地思考中国传统语言学看待汉语的眼光,通过汉语的古今比较、方言比较、与其他语言的比较,从材料的比较和梳理出发,提取新的理论,为普通语言学做出汉语研究者的贡献。

徐先生认为自己的学术历程是一个不懈探求中国语言理论建设之途径的历程(徐2005):从空对空地在术语概念中打转转,到尝试结合西方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方法并运用于分析古今汉语和方言的实际材料,再到从汉语材料和语言对比中探求中西语言学结合的基点所在,探求汉语以至人类语言的结构原理。下面我们的评述就以此为线索。

“文革”前的理论语言学,受政治思潮的影响,全面照搬苏联语言学,以批判西方资产阶级语言学为主要任务。徐先生这一时期有论文5篇,前4篇或是从时代之命的批判,或是从概念到概念的讨论。先生自己的评价是“现在回过头去,这些文章不值得重新再看”

(2005)。值得注意的是第5篇《对结构主义语言学分布原则的几点批判》(1965年,《中国语文》第2期)。该文提出,仅凭分布原则无法处理普通话 ts 、 $tʃ$ 、 $tʂ$ 、 k 四组多重互补分布声母的分合,无法解决宁波方言 e 、 o 、 β 、 ς 交叉分布的四个元音的音位归纳,必须辅之以语音相似原则和历史原则;仅凭分布也无法完全解决语素同一性的判定,必须辅之以“共同的语音结构”标准。在音位和语素之外,分布和变换分析的功用更加有限,如无法解决词义划分。这说明分布和变换都需要从意义和形式上做进一步的限定等等。这些观点都结合具体语言事实从学术角度展开了论证,至今来看仍有其价值。

“文革”后期,徐通锵先生对国内的理论语言学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认识到,像过去十年那样以马列主义语言学为圭臬、从概念到概念的研究,或者是简单地引入西方语言理论方法再贴上几个汉语的例子的研究,都算不上真正的理论研究。中国语言理论的建设应该立足汉语研究,吸收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精神,实现中西语言学的结合。但“中西”如何才能有效地结合,前面没有现成的路,这成为他的后半生不懈探索的目标。我们把徐先生“文革”后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梳理评说现当代汉语研究成果的阶段(1978—1981年)。这一时期,徐先生和叶蜚声合作撰写了《“五·四”以来汉语语法研究评述》(1979)、《译音对勘与汉语的音韵研究》(1980)、《历史比较法和〈切韵〉音系的研究》(1980)、《内部拟测法和汉语上古音系的研究》(1981)等四篇评论文章。评说范围不仅包括大陆学者的汉语研究,也包括境外学者的;评说内容不仅涉及现当代汉语研究

各项代表性成果的西方语言学背景,还涉及各项成果运用西方语言学结合汉语特点的程度;进而从中西结合的成效与局限的角度,总结了“五四”以来汉语研究的经验教训。探讨中西结合的成效与局限,需要对西方语言理论的再思考,也需要对汉语特点的再思考。这样的理论研究,不再是“空对空”,具体领域的研究者都感觉“有用”、“有启发”,在学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重要论著还有他与叶蜚声合作撰写的教材《语言学纲要》。该书明确地以结构主义语言思想为基础,以组合关系聚合关系为描写语言各层面结构关系的纲领,从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对语言结构性质做出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一部理论严谨、内容充实、线索简单清晰、深入浅出的教材,在国内高校语言学教学领域影响广泛。

第二阶段:历史语言学阶段(1981—1991年)。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专著《历史语言学》(1991),该书综合了他1979—1988年间撰写的多篇学术论文和所指导的硕士论文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第一部全面讨论语言演变一般原理的理论著作。

该书全面地介绍了历史语言学各个重要学派的理论方法,并综合运用这些方法,特别是当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最新成果“语言变异理论”的基本精神,结合汉语音韵史的文献材料,成功地分析了汉语方言的多个个案,阐述了各种性质不同的音变所特有的演变方式及演变原因。该书最具学术价值的是,以语言变异作为切入点,从“文白异读”这一与汉语特点密切相连的现象出发,提出并论证了“叠置式音变”这一新的音变方式。

《历史语言学》一书介绍的西方理论包括历史比较法、结构分

析法(音系平行对称说、推链与拉链、空格拟测法、基于不规则形态交替的拟测法)、波浪说和方言地理学、词汇扩散说、语言变异理论、语言年代学等等。除历史比较法、波浪说和方言地理学外,其他学说当时在国内还少有系统的介绍,语言变异理论则在国际学界也是新出不久的理论热点。

利用变异、区分性质不同音变的精彩个案分析有:①通过分析宁波“鸭”类词两种语音形式之间的关系,否定了赵元任等认为[ɛ]类语音为白读形式的说法,首次论证了“鸭”的[ɛ]类语音是儿化合音的残迹,并进而论证了如何辨别构词音变与语音演变的不同;②将祁县城关方言的 -β、-m 韵尾,放到整个音系的格局中,放到社团差异、小地区差异的系列中分析,揭示出这两个韵尾不是古代韵尾的遗留,而是元音高化、辅音唇化等音系内部自发音变共同作用的结果,具有新语法学派式音值渐变、结构主义平行链变的特点;③通过对宁波声调、祁县卷舌声母的社团内差异分析,论证了这些差异反映的是音系趋向简化的自发性音变,但具有王士元提出的音值突变、词汇渐变的词汇扩散式音变的特点;等等。

影响最大的是对闻喜、祁县方言文白异读的个案分析。这一研究收集了闻喜、祁县老中青不同年龄层的文白异读的差异,通过分析这些差异揭示出文白异读所反映的音变与新语法学派式完全不同,与词汇扩散式音变也有本质性区别:①词汇扩散式音变的条件总是共时音类(如卷舌声母、送气清声母等),而发生文白替代音变的音类却通常是当地共时音系已消失的古音条件(如中古全浊声母字)。这是因为古音条件是方言分歧发展的起点,是土语方言与权威方言字音相异的部分。②词汇扩散式音变对语词的风格色彩不敏感,而文读在词汇中的扩散与语词的新旧、语体色彩、地域通

用范围大小等密切相关,所以文读替代白读的过程延续的时间往往很长。根据这些特点论证了文白异读音变反映的是外部的权威方言音系经土语方言的改造进入土语音系,并与土语原有音系分层叠置、通过共时竞争而逐步取而代之的音变。考察还说明,叠置式音变也不是词汇借贷,字音的声韵调在语词中彼此相对独立地传播,多有一个语词中一个字音的声韵调“文白杂配”的现象,不像词汇借贷那样以词形为整体传播。

其他原创性的个案分析还有,对平定儿化和晋中“嵌1词”的分析首次报道了儿化成分可以前传至声韵之间;对宁波音系百年来演变分析揭示了由韵尾失落和元音高化引发的推链式变化;对闻喜声调的分析揭示出地区差异和连读变调等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是单字调混乱的原因;对汉语方言一二等韵格局及其演变的分析揭示了音系格局对各韵音值的制约关系等。

该书还评述了对汉藏语系系属划分的不同意见、汉语音韵史研究的三种模式框架。

书中个别个案的具体分析或理论阐述并非无可商榷。比如,宁波儿化应该是“不规则的词形交替与内部拟测”(又称“词形归一法”)极好的例证,而不是西方历史语言学理论无力处理的例证;平定儿化的“-儿”做后缀处理较之书中的“中缀”说更为合理,其活跃的时间应该是晚于而不是早于嵌1构词,等等。但个别分析的可商榷无碍于整部著作的学术价值。

该书为西方语言学理论如何有效地与汉语方言的活材料、与汉语音韵史的文献材料、与汉语音韵学传统研究的成果结合提供了范式,闯出了从汉语材料中提取新的普通语言理论的新路,从而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历史语言学、方言学的研究深度,得到学界普遍

的赞誉,影响遍及境内外。

1988年之后徐先生还有多篇有关历史语言学的重要文章发表,这些文章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从理论上进一步地阐述变异与结构、空间与时间的关系,阐述变异研究对于历史语言学理论的重要性,如《音系中的变异和内部拟测》(1988)、《变异中的时间和语言研究》(1989)、《结构的不平衡性和语言演变的原因》(1990)、《音系的结构格局和内部拟测法——汉语的介音对声母系统的演变的影响》(1994)等。另一类是针对汉语方言和汉藏语研究的具体问题提出新的见解:《山西方言古浊塞音、浊塞擦音今音的三种类型和语言史的研究》(1990)提出中古全浊声母在今山西方言的三种表现反映了原始语中已有的方言的差别,它们分别与今客赣方言、吴方言、北方方言同一支派。《阴阳对转新论》(1996)以现代方言的文白异读来解释上古的阴阳对转。《声母语音特征的变化和声调的起源》(1998)提出声调的起源只与声母的清浊或声母的前置辅音有关而与韵尾无关,汉语上去两声来源于韵尾说不可靠。《音变的规律和汉语方言的分区》(2004)根据关系到音系整体的几次重要音变(三大发音部位的分化、全浊声母的分派、调分阴阳)的时间先后和分派去向,分层次地划分出汉语方言分化的年代,并据此提出了新的方言分区方案。这四篇文章都提出了全新的看法,学界赞同者有之,不赞同者亦有之;特别是对于声调起源的看法学界几乎没有赞同的声音。但徐先生提出的看法都有自己的材料依据,引发的讨论推进了问题的研究。

第三阶段:字本位与语义句法论阶段(1991—2006年)。这一阶段时间最长,是徐先生付出心血最多、论著数量最多的阶段,共